

# 探究朱熹的歷史到思維中「道學」的建構

## 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讀後

柯品文 ◎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中心講師



「道學」在北宋儒學復興運動中，原本只是一個旁支，到了南宋卻逐漸發展成主流。而道學一詞的內涵，在程朱學術被欽定為「正統」後，也由原先較寬闊的理解，變成專指「程朱學術」的狹義用法，使得同時代其他道學人物的貢獻被後人所忽略。

然而，正是因為同時代其他道學人物的貢獻被後人所忽略，於是田浩以《朱熹的思維世界》一書，透過南宋朱熹與其他道學家的思想影響進而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來進行重新探討：第一，當將朱熹放置於同時代的儒家思想家的大框架中，我們對於朱熹及其思想是否能有新的理解？……第二，在社會、政治和文化上具有共同關注的一群儒家學者所組成的『道學團體』，是如何發展演變成自成一家的思想學派，乃至到南宋末期正式成為政治思想上的正統學說。（注1）

確實，將朱熹置於其中的歷史脈絡中，並透過四部四時期的各人物思想關係來帶出「道學」系統的蘊含，一方面探討朱熹與當時學者的論學過程與思想交流，考察朱熹如何逐步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最後甚至突破政治的禁錮，取得道學權威的地位。

作者田浩，哈佛大學歷史學與東亞語言學博士。2004年，任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曾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文哲所、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等訪問學者，並受邀為華盛頓大學歷史系訪問教授。本書可說是一部南宋道學史，書中有別於傳統的論述，為此領域提供一個長期欠缺的獨立新觀點。

本書將南宋的道學發展分成四個時期，分別是第一時期（1127 - 1162年）、第二時期（1163 - 1181年）、第三時期（1182 - 1202年）與第四時期（1202 - 1279年），共11章，先後探討「南宋第一代學人：張九成與胡宏」、「朱熹與呂祖謙」、「朱熹與陳亮」、「朱熹與陸九淵」、「朱熹的祈禱文

與道統觀」與「朱熹門人與其他道學家」等層層辯析。

但「朱熹為什麼能夠在 12 世紀末期成為道學的核心？」（注 2）這其中所涉及的「朱熹的言行與道學團體的關係與影響」，以及「朱熹在道學上的位置等問題」上，在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注 3）一書中即以針對宋代文化史與其政治史的綜合研究提出其深入探討，尤其在「文化史」和「政治史」二者之間互動關係，更深入研究朱熹時代的歷史世界與其時代背景，採以系統而全面地從史料中搜尋一切相關的論述證據，藉以重建 12 世紀宋代最後二、三十年的文化史與政治史的面貌。

於是，從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到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這兩書對「宋代文化和政治史」與「朱熹與其他道學家的思想影響」的深入探討當中，不只為朱熹所處的宋代歷史世界提供了一個較廣闊的思考背景，更論及宋代儒學的復興及其演進過程，這其中表現在政治史上的層面，主要顯現在宋士階層改革活動當中的權力結構與運作方式的二元辯證。其中，《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主要以宋代「士階層」為主體（而士大夫是當時宋代的文化主體也是政治主體），因此透過以回向「三代」為宋代政治文化的開端，並探討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過程（注 4）。

檢視宋代實際的歷史過程發展，探討「朱熹的歷史世界」這其中「權力結構」和

「運作方式」的發展，可以窺見在士大夫的文化與政治兩者整體運作的歷史過程之最大的關鍵便是出現於朱熹時代政治史上最後慶元黨禁的結局，反映在時代上則以「理學派」、「官僚集團」和「皇權」三者之間的互動。

宋代士階層不但是宋代政治的文化主體，也同時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體，士階層在政治上所表現的主動性超過了以前的漢、唐和後面的元、明、清。宋代「士」的政治地位，源自於宋太祖在立國之初為其政治權力之鞏固與長久之延續之目的，藩鎮罷權顯示出宋代「士」的政治地位的被看重與其歷史背景的意義。於是從太祖以降「不殺大臣及言事官」之家法承傳下來，更為「士大夫」的政治地位提供如同法源般穩若磐石的象徵意義，而且，窺其宋代以文為重的歷史背景，帝王重視士大夫正是因為他們需要士階層的支持與維護其權力中心，但同時宋代帝王卻也一方面保持一定的君權和相權間的權力抗衡關係，可以說，宋代皇帝基本上接受了儒家的政治原則，一方面把士大夫當作「共治」的夥伴，另一方面又尊重他們「以道進退」的精神，這是宋代文化和政治在中國史上的一個非常顯著的特色。

再者，宋代士大夫「同治天下」的思想為政治主體意識的顯現（注 5），朱熹在《跋范文正公家書》特別指出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為士大夫的座右銘，其中「士以天下為己任」這

一普遍知識的出現，確實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個新發展，亦代表了宋代士大夫中「道學」的一個典型，也反映了當時士大夫的生活面相，例如，朱熹與許多學者都致力建立儒教的理想社會，而借用他們的社區組織的模式，發展社倉、書院等組織。本書在檢討儒家的理想怎樣推動宋代歷史的進程與關於宋代儒學復興的起源中，尤其以對朱熹的道學觀察分析出宋初儒學的主要特徵，即是以二程代表道學（或理學）的開端，在二程之前，胡瑗、孫復、石介等諸儒已開北宋儒學的「先河」。

在宋朝理宗皇帝訂定以朱熹為代表的道學思想之前，可以說南宋學術界並非獨尊朱學，當時甚至是開放且各家彼此爭鳴的多元思想世界，田浩指出這個世界即是以韓愈所提倡的孔孟道統為主軸，與北宋周敦頤、張載、二程的道統傳承，並從這當中凸顯出朱熹在道學系統中的位置。

且田浩在書中的幾個重要論點帶出「道學」是宋代常用的術語，所指的是一批人試圖用政治影響來改良社會和政府；而「理學」則是宋代一個不太常用的範疇，且更側重於抽象和形而上的哲學概念：所討論的道德學術交流包含三個關鍵，儒家理論層次，一、西方人所謂的哲學思辨；二、文化價值；三、現實政論。……其中朱熹在談論文化價值常點出「道」和「器」，而在抽象的基本原理的層次裡，常常說「理」和「氣」。……更明確地說，「道」指一切可知之理的總和，而「理」則顯示一種較具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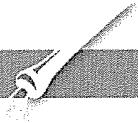
析傾向的觀點；朱熹說：「道是統名，理是細目。」（注6）

本書不只點出朱熹在宋代哲學的重要性，更將宋代幾個重要的思想家，與其宋代的社會政治背景與思想系統，進行各面向的文化論辨，將朱熹放入南宋當時的情境中，透過與其他主要學者如呂祖謙、陳亮、陸九淵及相關人物的關係與往來，進行考察以凸顯「道學」思想觀念的運作，體現朱熹的生命意義決不止於「內聖」，其「得君行道」的理想也是其所熱衷。

從朱熹的歷史世界到思維世界，一方面為探究與重構宋代文化史與政治史的理想與努力做了最好的見證，另一方面將朱熹的思想發展放置於他與同時代學者交流的背景下理解，以使產生新的角度研究其思想，多元析論當時的歷史背景與政治氛圍，並闡述各時期道學代表人物的思想與對道學的貢獻，呈現道學在發展過程中的多樣性與開放性，也讓世人窺析「道學」在定於一尊前較完整的風貌，更提供研究朱熹及宋代學術者更廣闊的思考方向。ISBN

### 注釋

1. 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臺北：允晨文化，2008），頁21。
2. 同上，頁448。
3.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臺北：允晨文化，2003）。ISBN 9789570329537。《朱熹的歷史世界》透過12章節介紹有關政治文化的對應，從中點出宋代



士大夫的思維結構與行動模式，在這本書中佔據了軸心的位置，而確實，以朱熹為中心，細辨「道統」、「道學」、「道體」等概念及其在理學史上的演變，認為只有通過時代文化思想概念的辨析和歷史追溯的交互運用與辨證思考，對於宋代「道學與理學」與「帝王和士大夫階層間關係」的內在聯繫才能獲得澄清。

4.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臺北：允晨文化，2003）。ISBN 9789570329537。第一階段是仁宗之世（建立期），宋初儒學明確的在重建政治、社會秩序方面，主張要超越漢、唐，回到「三代」的理想，所以范仲淹所提倡的士大夫當「以天下為己任」的理念獲得了廣大的回響。第二階段是

熙寧變法（定型期），也是士大夫作為政治主體在權力核心正式發揮作用的時候，此一時期的重大突破為皇帝須與士大夫「共定國是」。第三階段為朱熹的時代（轉型期），士大夫的政治文化開始有所轉變，異於熙寧變法時的型態，但士大夫主體意識的覺醒仍是貫通宋代政治文化三大階段的主要線索。

5. 「同治」或「共治」天下是宋代儒家士大夫的政治主體意識，他們雖然接受了「權源在君」的事實，卻毫不懷疑的將「治天下」的大任直接放在自己的身上，這一意義上顯然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在「治道」方面的體現。
6. 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臺北：允晨文化，2008），頁 42-43。

